

梁由之 主编

梦想与路径

1911—2011百年文萃

II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創刊1897

梦想与路径

1911-2011百年文萃

梁由之
主编

II

1939-1991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952-1097

目录

- 1939 | 钱穆:《国史大纲》引论(附《〈国史大纲〉前言》)·483
- 1940 | 雷海宗:历史警觉性的时限·503
陈寅恪: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序·506
陈独秀:我的根本意见·508
毛泽东: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(存目)·512
- 1942 | 王实味:野百合花·513
丁玲:“三八节”有感·519
- 1943 | 汤用彤: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·532
陈铨:“五四”运动与狂飙运动·536
龙季子:实行工业化的条件·542
- 1944 | 郭沫若:甲申三百年祭·549
周作人:甲申怀古·565
聂绀弩:明末遗恨·568
冯友兰:别共殊·569
赵超构:延安一月(存目)·577
- 1945 | 《新华日报》社论:新闻自由——民主的基础·578
成舍我: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·582
- 1946 | 闻一多: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·586
郭沫若:论郁达夫·590

- 萧公权: 圣教与异端
——从政治思想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·596
- 储安平: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·608
- 徐铸成: 记者节上的讲话·612
- 1947 | 储安平: 中国的政局·614
傅斯年: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·623
- 1948 | 萧乾: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——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·628
胡适: 自由主义·633
瞿同祖: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·638
- 1949 | 《人民日报》社论: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·652
- 1950 | 刘少奇: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(存目)·655
- 1951 | 毛泽东: 应当重视电影《武训传》的讨论(存目)·656
- 1953 | 徐复观: 学术与政治之间·657
- 1954 | 李希凡、蓝翎: 关于《红楼梦简论》及其他(存目)·664
胡风: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(存目)·665
- 1955 | 殷海光: 民主底试金石·666
- 1956 | 《人民日报》社论: 要反对保守主义,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·675
钟惦棐: 电影的锣鼓·679
- 1957 | 钱钟书: 《宋诗选注》序·683
钟叔河: 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(附《错就错在要思想》)·698
马寅初: 新人口论(存目)·706
费孝通: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(存目)·707
《人民日报》社论: 这是为什么?(存目)·708
- 1958 | 张春桥: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(存目)·709
柯庆施: 乘风破浪, 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!(存目)·710
- 1959 | 胡适: 容忍与自由·711
谭其骧: 论曹操·715
沈云龙: 黄克强与陈英士(存目)·725

- 1960 | 殷海光: 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· 726
- 1962 | 邓拓: 王道和霸道 · 732
李济: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(存目) · 735
- 1965 | 殷海光: 自由的伦理基础 · 736
姚文元: 评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(存目) · 766
- 1966 | 《人民日报》社论: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· 767
毛泽东: 给江青的一封信 (存目) · 770
遇罗克: 出身论 (存目) · 771
- 1972 | 周培源: 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 (存目) · 772
- 1973 | 顾准: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(存目) · 773
赵元任: 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 (存目) · 774
- 1975 | 陈敏之: 送别——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 (存目) · 775
- 1977 | 白先勇: 《现代文学》的回顾与前瞻 · 776
- 1978 | 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: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(存目) · 785
- 1979 | 李洪林: 读书无禁区 · 786
王春瑜: “万岁”考 · 791
余光中: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· 796
- 1980 | 聂绀弩: 七十年前的开笔 · 807
余光中: 缪斯的左右手——诗和散文的比较 (存目) · 811
陈旭麓: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(存目) · 812
金观涛、刘青峰: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: 一个超稳定系统 (存目) · 813
- 1981 | 黄裳: 海滨消夏记 · 814
叶圣陶: 我呼吁 · 821
- 1982 | 何兆武、何高济: 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中译者序言 · 824
唐凤楼: 我和“阿诗玛”的悲欢 (存目) · 841
- 1983 | 徐梵澄: 星花旧影——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· 842
徐敬亚: 崛起的诗群 (存目) · 860

- 1984 | 孙犁: 病期经历 · 861
黎澍: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· 870
余英时: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(存目) · 881
- 1985 | 柯灵: 遥寄张爱玲 · 882
- 1986 | 谭其骧: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· 889
李纯青: 为评价《大公报》提供史实 · 902
朱大可: 谢晋模式: 当代电影的图腾和衰变信号 · 916
沈玉成: 自称“宋朝人”的王仲闻先生 · 924
李泽厚: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(存目) · 930
- 1987 | 李泽厚: 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——“五四”回想之三 · 931
李侠文: 我所认识的张季鸾、胡政之两先生 · 952
汪曾祺: 《汪曾祺自选集》自序 · 963
- 1988 | 施蛰存: 滇云浦雨话从文 · 966
费孝通: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· 973
余英时: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
——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 · 999
张广照: 社会进步需要言论自由 · 1021
- 1989 | 何博传: 现代危机论与中国问题研究 (存目) · 1024
周涛: 黄河漂流探险目击记 (存目) · 1025
- 1991 | 何平: 侠义英雄的荣与衰——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读 · 1026



1939

抗战期间，“一生为故国招魂”的钱穆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，以对“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”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潜心撰成此书。1940年出版后风行全国，成为各大学通用历史教科书，影响至今靡衰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在时移景迁的当下，在“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”的同时，当切记“必须……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”（陈寅恪语），而不能固步自封，画地为牢。这样，方能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（鲁迅语）。

《国史大纲》引论

钱穆 1895—1990，江苏无锡人，字宾四。著名历史学家，“现代新儒学”主要代表性人物。曾任燕京、清华、北大、北平师大、西南联大、华西、四川、江南等大学教授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、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。1949年迁居香港，创办新亚书院。1967年移居台湾。治学兼通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一生致力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独特性研究，认为中国思想的精神是求人生真理与宇宙真理的合一。著有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《国史大纲》等。

余英时、严耕望等人都是他的弟子。

—

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，举其特点有三。一者“悠久”。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。从《古竹书纪年》载夏以来，约得三千七百余年。（夏四七二，殷四九六，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，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。）二者“无间断”。自周共和行政以下，明白有年可稽。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，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。）自鲁隐公元年以下，明白有月日可详。（春秋编年从此始，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。鲁哀公卒，左传终，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。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冶通鉴托始，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。）三者“详密”。此指史书体裁言。要别有三：一曰编年（此本春秋），二曰纪传（此称正史，本史记），三曰纪事本末（此本尚书）。其他不胜备举（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）。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，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，因此益形成其繁富。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，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，则我华夏文化，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。

然中国最近，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。何言之？“历史智识”与“历史材料”

不同。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，是为历史。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，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，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。材料累积而愈多，智识则与时以俱新。历史智识，随时变迁，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，有亲切之联络。历史智识，贵能鉴古而知今。至于历史材料，则为前人所记录，前人不知后事，故其所记，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以欲知。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，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。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，则所谓“史”者非史，而所谓“识”者无识，生乎今而臆古，无当于“鉴于古而知今”之任也。

今人率言“革新”，然革新固当知旧。不识病象，何施刀药？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，蛮干强为，求其实现，鲁莽灭裂，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。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，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。唯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，亦唯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，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。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，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，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。

且人类常情，必先“认识”乃生“情感”。人最亲者父母，其次兄弟、夫妇乃至朋友。凡其所爱，必其所知。人唯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。人亦唯爱其所崇重，人亦唯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。求人之敬事上帝，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，不啻当面觑体焉，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，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。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。唯人事上帝本乎信仰，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，此其异耳。人之父母，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；人之所爱，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，而无害其为父母，为所爱者。唯知之深，故爱之切。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，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。此民族中之分子，对其民族，必无甚深之爱，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，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。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，以为无足重视；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，懵无所知，而犹空呼爱国。此其为爱，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，如农人之爱其牛。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，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！凡今之断脰决胸而不顾，以效死于前敌者，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，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；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，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。

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，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。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，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。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，其要在此。

二

略论中国近世史学，可分三派述之。一曰传统派（亦可谓“记诵派”），二曰革新派

(亦可谓“宣传派”),三曰科学派(亦可谓“考订派”)。“传统派”主于记诵,熟谙典章制度,多识前言往行,亦间为校勘辑补。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之时之旧规模者也。其次曰“革新派”,则起于清之季世,为有志功业、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。最后曰“科学派”,乃承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”之潮流而起。此派与传统派,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,路径较近;博洽有所不逮,而精密时或过之。二派之治史,同于缺乏系统,无意义,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,与当身现实无预。无宁以“记诵”一派,犹因熟谙典章制度,多识前言往行,博洽史实,稍近人事;纵若无补于世,亦将有益于己。至“考订派”则震于“科学方法”之美名,往往割裂史实,为局部狭窄狭之追究。以活的人事,换为死的材料。治史譬如治岩矿,治电力,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,亦于先民文化精神,漠然无所用其情。彼唯尚实证,夸创获,号客观,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,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。

唯“革新”一派,其治史为有意义,能具系统,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,能求把握全史,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。故革新派之治史,其言论意见,多能不胫而走,风靡全国。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,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。虽然,“革新派”之于史也,急于求智识,而怠于问材料。其甚者,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,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,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,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。因此其于史,既不能如“记诵派”所知之广,亦不能如“考订派”所获之精。彼于史实,往往一无所知。彼之所谓系统,不啻为空中之楼阁。彼治史之意义,转成无意义。彼之把握全史,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。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,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,而非有外在之根据。其结合历史与现实也,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。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,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。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,知识既不真,事功亦有限。今我国人乃唯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,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,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,乃最为无识也。

三

所谓“革新派”之史学,亦随时递变。约言之,亦可分为三期。其先当前清末叶。当时,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,厥在“政体”。故彼辈论史,则曰:“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,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。”彼辈谓:“《二十四史》乃帝王之家谱。”彼辈于一切史实,皆以“专制黑暗”一语抹杀。彼辈对当前病症,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。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,则此等议论,亦功成身退,为明日之黄花矣。继“政治革命”

而起者，有“文化革命”。彼辈之目光，渐从“政治”转移而及“学术思想”，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，亦转集于“学术思想”之一途。故彼辈论史，则曰：“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，思想停滞无进步，而一切事态，因亦相随停滞不进。”彼辈或则谓：“两千年来思想，皆为孔学所掩胁。”或则谓：“两千年来思想，皆为老学所麻醉。”故或则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，或则归罪于老子。或谓：“两千年来思想界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。”或则谓：“此两千年来之思想，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‘中古时期’。要之如一丘之貉，非现代之所需。”或则谓：“思想限制于文字，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思想之沉痾积毒，莫如并废文字，创为罗马拼音，庶乎有瘳。”然待此等宣传成功，则此等见识，亦将为良弓之藏。继“文化革命”而起者，有“经济革命”。彼辈谓：“无论‘政治’与‘学术’，其后面常为‘社会形态’所规定。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、学术内容，其先应从事于‘社会经济形态’之改造。”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，影响及于论史，则曰：“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，皆一‘封建时期’也。两千年来之政治，两千年来之学术，莫不与此两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，所谓‘封建时期’者相协应。”正唯经济改革未有成功，故此辈议论，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。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：“国史浩如烟海，我知就我力之所及，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，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，何事此放言高论为！”虽然，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，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，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，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，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。有告之者曰：“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，皆专制黑暗之历史也。”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，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。或告之曰：“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，皆孔子、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。”则彼固已呼吸于20世纪新空气之仙囿，于孔、老之为人与其所言，固久已鄙薄而弗睹，暗留而无知，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，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。或告之曰：“我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，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，虽至今犹然，一切病痛尽在是矣。”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，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，莫不动色称道，虽牵鼻而从，有勿悔矣。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，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、覆酱瓿，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。

四

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，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智识，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。就前有诸史言之，《尚书》为最初之史书，然《书》缺有间，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。其次有《春秋》，为最初之编年史。又其次有《左传》，以网罗详备言，为编年史之进步。然其时则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祭

祀乃常事，常事可以不书，兵戎非常事，故《左传》所载，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，后人讥之为“相斫书”焉。又其次为《史记》，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，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，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、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。又其次为《汉书》，为断代作史之开始，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，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“正史”，继此而复生“通史”之新要求。于是而有杜佑《通典》，此为“政书”之创作，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，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，不能有此。又继而有《通鉴》，为编年之新通史。又次而有各史记事本末，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。然如袁氏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取材只限于《通鉴》，则貌变而实未变也。于是而有郑樵《通志》之所谓《二十略》，其历史眼光，乃超出于政治人物、人事、年月之外。其他如方志，如家谱，如学案，形形色色，乘一时代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，不胜缕举。要之自《尚书》下逮《通志》，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。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，与夫内容之差别，可知中国旧史，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。

自南宋以来，又七百年，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。此因元、清两代皆以异族入主，不愿国人之治史。明厕其间，光辉乍辟，翳霾复兴，遂亦不能有所修造。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，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。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，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，乃愈昏昧无准则。前述记诵、考订、宣传诸派，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，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。

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，将为自《尚书》以来下至《通志》一类之一种新通史。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，而又必须具备两条件：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，明白示人，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；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，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。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，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；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，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。此种新通史，其最主要之任务，尤在将国史真态，传播于国人之前，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，而油然而与其慨想，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。

此种通史，无疑的将以记诵、考订派之工夫，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。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，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，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。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，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贯通。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，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，亦可由此想见矣。

五

“一部《二十四史》，从何说起？”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，首必感有此苦。其将效记诵、考订派之所为乎？则必泛滥而无归。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？又必空洞而无物。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：首则曰政治制度，次则曰学术思想，又次则曰社会经济。此三者，“社会经济”为其最下层之基础，“政治制度”为其最上层之结顶，而“学术思想”则为其中层之干柱。大体言之，历史事态，要不出此三者之外。今将轻重先后，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？抑兼罗并包，平等而同视之乎？

曰，姑舍此。能近取譬，试设一浅喻。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，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，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异矣。即为一网球家作小传或年谱，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，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。何以故？以音乐家之“个性”与“环境”与“事业”之发展，与运动家不同故；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，又与足球家不同故；一人如此，一民族、一国家亦然。写国史者，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“个性”之所在，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“环境”与“事业”，而写出其特殊之“精神”与“面相”。然反言之，亦唯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，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。如此则循环反复，欲认识一国家、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，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。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、面相之特殊个性，则一也。

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？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，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。其他一切饮食、起居、嗜好、信仰，可以无所异于人。若为网球家作年谱，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，则某年音乐大会，其人既无预；某年歌曲比赛，某人又不列。其人者，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。不仅了不异人，抑且有不如无。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。网球家之生命，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中求取。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，竟蹈此弊。

以言政治，求一屡争不舍、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，如英伦之“大宪章”与“国会”之创新而无有也。又求一轰轰烈烈，明白痛快，如法国“人权大革命”之爆发，而更无有也。则无怪于谓“自秦以来两千年，皆专制黑暗之历史”矣。以言思想，求一如“文艺复兴运动”以来，各国学者蓬勃四起，各为其国家民族创造其特有新兴之文学而无有也。又求一如马丁路德，明揭“信仰自由”之旗帜，以与罗马教皇力抗，轩然兴起全欧“宗教革命”之巨波，而更无有也。则无怪于谓“自秦以来两千年，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”矣。以言经济，求一如噶马、如哥伦布凿空海外，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；求

如今日欧、美社会之光怪陆离，穷富极华之景象，而更不可得。则无怪于谓“自秦以来两千年，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，长夜漫漫，永无旦日”矣。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，莫不讴歌欧、美，力求步驱，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，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。迷于彼而忘其我，拘于貌而忽其情。反观祖国，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，我乃一无有。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，乃若一冬蛰之虫，生气未绝，活动全失。彼方目眇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围之采声，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、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。故曰：治国史之第一任务，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，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。

六

凡治史有两端：一曰求其“异”，二曰求其“同”。何谓求其异？凡某一时代之状态，有与其先、后时代突然不同者，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“特性”。从两“状态”之相异，即两个“特性”之衔接，而划分为两时代。从两时代之划分，而看出历史之“变”。从“变”之倾向，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。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天阏，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。此一法也。何谓求其同？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，求出其各“基相”。此各基相相衔接、相连贯而成一整面，此为全史之动态。以各段之“变”，形成一全程之“动”。即以一整体之“动”，而显出各分部之“变”。于诸异中见一同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。全史之不断变动，其中宛然有一进程。自其推动向前而言，是谓其民族之“精神”，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。自其到达前程而言，是谓其民族之“文化”，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。此谓求其同。此又一法也。

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，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。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，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。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“学术思想”（例如战国先秦），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。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“政治制度”（例如秦汉），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。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“社会经济”（例如三国魏晋），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。“变”之所在，即历史精神之所在，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。而所谓“变”者，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，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。此有明白事证，与人共见，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。故曰：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。革新派言史，每曰“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”云云，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无变，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历史无精神、民族无文化也。其然，岂其然？

七

今于国史，若细心籀其动态，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，即我民族文化常于“和平”中得进展是也。欧洲史每常于“战争”中著精神。如火如荼，可歌可泣。划界限的时期，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。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，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。中国史上，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，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，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。秦末刘、项之乱，可谓例外。明祖崛起，扫除胡尘，光复故土，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。其他如汉末黄巾，乃至黄巢、张献忠、李自成，全是混乱破坏，只见倒退，无上进。近人治史，颇推洪、杨。夫洪、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，然此固然矣。然洪、杨十余年扰乱，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，成就何在？建设何在？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，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。然中国史非无进展，中国史之进展，乃常在和平形态下，以舒齐步骤得之。若空洞设譬，中国史如一首诗，西洋史如一本剧。一本剧之各幕，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。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，令人不可划分。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学之最美部分，而剧曲之在中国，不占地位。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。即以人物作证，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，耶稣死于十字架，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，晨起扶杖逍遥，咏歌自挽。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，其景象不同如此，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。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，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，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。

八

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。就政治上言之，秦、汉大一统政府之创建，已为国史辟一奇绩。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，然二者立国基本精神已不同。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。欧、亚、非三洲之疆土，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。仅此中心，尚复有贵族、平民之别。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，蛮族侵入，如以利刃刺其心窝，而帝国全部，即告瓦解。此罗马立国形态也。秦、汉统一政府，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，征服四围，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，共同参加，以造成一中央。且此四围，亦更无阶级之分。所谓优秀力量者，乃常从社会整体中，自由透露，活泼转换。因此其建国工作，在中央之缔构，而非四围之征服。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，光耀四壁；秦、汉则室之四周，遍悬诸灯，交射互映；故罗马碎其巨灯，全室即暗，秦、汉则灯不俱坏光不

全绝。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，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。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，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，艰难缔构，仅而得之。以近世科学发达，交通便利，美人立国，乃与我差似。如英、法诸邦，则领土虽广，唯以武力贯彻，犹惴惴惧不终日。此皆罗马之遗式，非中国之成规也。

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，不知中国自秦以来，立国规模，广土众民，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。故秦始皇始一海内，而李斯、蒙恬之属，皆以游士擅政，秦之子弟宗戚，一无预焉。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，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！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，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，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，终以告歇。博士弟子，补郎、补吏，为入仕正轨，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。自此以往，入仕得官，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。“王室”与“政府”逐步分离，“民众”与“政府”则逐步接近。政权逐步解放，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，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。综观国史，政制演进，约得三级：由封建而跻统一，一也。（此在秦、汉完成之。）由宗室、外戚、军人所组之政府，渐变而为士人政府，二也。（此自西汉中叶以下，迄于东汉完成之。）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，三也。（此在隋、唐两代完成之。）唯其如此，“考试”与“铨选”，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。全国政事付之官吏，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，则一唯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。此二者，皆有客观之法规，为公开的准绳，有皇帝（王室代表）所不能摇，宰相（政府首领）所不能动者。若于此等政制后面推寻其意义，此即《礼运》所谓“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”之旨。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，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，以服务于国家；再就其服务成绩，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。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赜，而秦、汉以下政制，即向此演进。特以国史进程，每于和平中得伸展，昧者不察，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，唯有专制黑暗，不悟政制后面，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。

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，无宪法。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，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，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，不必泥以求也。中国自秦以来，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，如欧西近代所行民选代议士制度，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。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，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，使得有参政之机会；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，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，则下情上达，本非无路。晚清革命派，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，固有效矣。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，谓自秦以来，中国唯有专制黑暗，若谓“民无权，国无法”者已两千年之久，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。民国以来，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，终以不切国情，一时未能切实推行。而历古相传“考试”与“铨选”之制度，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，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。于是一切

官场之腐败混乱，胥乘而起，至今为厉。此不明国史真相，妄肆破坏，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。

中国政制所由表达民权之方式与机构，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。故欲争取民权，而保育长养之，亦复自有其道。何者？彼我立国规模既别，演进渊源又不同。甲族甲国之所宜，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，其例实伙。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，往往发动既难，收拾亦不易，所得不如其所期，而破坏远过于建设。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，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，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，亦正我先民所始政制，以求适合于我国情，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。若复不明国史真相，妄肆破坏，轻言改革，则又必有其所应食之恶果在矣。

九

其次请言学术思想。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，拟之欧洲之“中古时期”。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。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，以“宗教”为主脑，而中国学术界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。姑以史学言，古者学术统于王官，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。“史”者，乃宗庙职司之一员，故宗教、贵族、学术三者，常相合而不相离。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《春秋》，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”，皆政治社会实事，不语怪力乱神，故曰：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？”自有孔子，而史学乃始与宗教、贵族二者脱离。然西汉司马氏尚谓：“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，主上以倡优畜之。”此非愤辞，乃实语。汉代太史属于太常，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。太乐、太祝、太宰、太卜、太医与太史，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。太乐之下，自有倡优。宗庙祭祀，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。则史学仍统于皇帝、宗庙、鬼神之下。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，发愤为《史记》，自负以续孔子之《春秋》；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，质实而书，无所掩饰。司马氏不以得罪。及东汉班氏，以非史官，为史下狱，然寻得释，所草悬为国史。自此以往，中国史学，已完全由皇帝、宗庙下脱出，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。

且王官之学，流而为百家，于是“史官”之外，复有“博士”。此二官者，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。“史官”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，而“博士官”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。博士亦属太常，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。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，而博士得预闻朝政，出席廷议而见咨询，则社会新兴百家学，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。然自秦以来，占梦、求仙之术，皆得为博士，犹在帝王所好。及汉武听董仲舒议，罢黜百家，专立《五经》博士，于是博士性质，大见澄清；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，而

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（所谓“通经致用”，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，在现实政治下应用），又同时兼负国家教育之责。而博士弟子，遂为入仕唯一正途。于是学术不仅从“宗教”势力下脱离，并复于“政治”势力下独立。自此以往，学术地位，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，而享有其自由，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。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，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，乃为地上之王国，而非空中之天国也。孔子成《春秋》，前耶稣降生四百八十年。司马迁为《史记》，亦前耶稣降生一百年。其时中国政治社会，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，人生之伦理教育，即其“宗教”，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；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。耶教之推行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，地上之幸福渺渺不可望，乃折而归向上帝。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，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，同时又替代一部分（或可说大部分）政治之任务。若必以中国史相拟，唯三国魏晋之际，统一政府覆亡，社会纷乱，佛教输入，差为近之。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，以及立国之理论，仍沿两汉而来。当时帝王卿相，诚心皈依佛教者，非无其人；要之，僧人与佛经，特为人生一旁趋，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与为代兴。隋唐统一政府复建，其精神渊源，明为孔子、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，而佛教在政治上，则无其指导之地位。西洋所谓“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”之观感，在中国则绝无其事。继隋唐统一之盛运而起者，有禅宗思想之盛行。禅宗教理，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，其态度路径，正有相似处。然西洋宗教革命，引起长期间惨酷的普遍相互屠杀，而中国则无之者，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，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，包揽政治、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，因此由其教理上之改革，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。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，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，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，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，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。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，仍从此源头上演进，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纽以后，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。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，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，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？则以罗马建国，本与汉代精神不同。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，及贵族、军人腐败堕落，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。北方蛮族，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，及其踏破罗马以后，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，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，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。要之，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，乃属两个生命，前者已老死，后者未长成，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。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，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，乃由当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、所缔构而成此境界。换言之，秦、汉统一，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，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；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，罗马民族崛起，仍是两个生命，不相衔接也。